

20世纪

# 中国杂文史

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背疽，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攻，以实攻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



姚春树 袁勇麟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世纪

# 中国杂文史

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攻，以实攻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



……姚春树 袁勇麟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杂文史/姚春树,袁勇麟著.—2 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34—2528—9

I. ①2… II. ①姚…②袁… III. ①杂文—文学史—中国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607 号

## 20 世纪中国杂文史(上、中、下册)

姚春树 袁勇麟 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西)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5

插 页 8

字 数 838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2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2528—9

定 价 89.40 元(上、中、下册)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 目 录

## 第二编 现代杂文的创立和成熟

(1917~1937)(续)

|                          |       |
|--------------------------|-------|
| 第十六章 杂文大家周作人 .....       | (235) |
| 第一节 周作人主要是个杂文家 .....     | (236) |
| 第二节 周作人杂文的演变 .....       | (241) |
| 第三节 周作人杂文的艺术风格 .....     | (247) |
| 第十七章 林语堂的杂文 .....        | (250) |
| 第一节 从《语丝》前期到《论语》时期 ..... | (250) |
| 第二节 林语堂杂文的艺术风格 .....     | (255) |

## 第三编 现代杂文的全面发展

(1937~1949)

|                             |       |
|-----------------------------|-------|
| 第十八章 战争环境下杂文的新机遇和新发展 .....  | (261) |
| 第一节 杂文向全国铺展 .....           | (262) |
| 第二节 主要杂文流派和杂文作家群 .....      | (264) |
| 第三节 杂文理论的新发展 .....          | (269) |
| 第四节 杂文艺术的全面发展 .....         | (276) |
| 第十九章 上海“孤岛”的“鲁迅风”杂文流派 ..... | (279) |
| 第一节 流派概况 .....              | (279) |
| 第二节 唐弢的杂文 .....             | (285) |
| 第三节 王任叔、周木斋、柯灵的杂文 .....     | (291) |
| 第二十章 桂林和香港的“野草”杂文流派 .....   | (296) |



|       |                              |       |
|-------|------------------------------|-------|
| 第一节   | 流派概况 .....                   | (296) |
| 第二节   | 夏衍的杂文 .....                  | (302) |
| 第三节   | 宋云彬、孟超、秦似的杂文 .....           | (304) |
| 第二十一章 | 杂文大家聂绀弩 .....                | (309) |
| 第一节   | 杂文创作的演变和发展 .....             | (310) |
| 第二节   | 杂文艺术的师承和创造 .....             | (314) |
| 第二十二章 | 重庆杂文作家群 .....                | (320) |
| 第一节   | 郭沫若的杂文 .....                 | (320) |
| 第二节   | 冯雪峰的杂文 .....                 | (325) |
| 第三节   | 胡风、廖沫沙、田仲济的杂文 .....          | (333) |
| 第二十三章 | 昆明杂文作家群 .....                | (341) |
| 第一节   | 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           | (341) |
| 第二节   | 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的杂文 .....          | (347) |
| 第二十四章 | 梁实秋、钱钟书的人生随笔 .....           | (352) |
| 第一节   |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             | (352) |
| 第二节   | 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 .....           | (357) |
| 第二十五章 | 黄裳、张恨水、欧小牧的杂文 .....          | (361) |
| 第一节   | 黄裳的论剧杂文 .....                | (361) |
| 第二节   | 张恨水、欧小牧的古典小说新解杂文 .....       | (369) |
| 第二十六章 | 延安杂文的兴衰 .....                | (373) |
| 第一节   | 对王实味等杂文批判的再评价 .....          | (373) |
| 第二节   | 谢觉哉、艾思奇、胡乔木、何其芳、林默涵的杂文 ..... | (377) |

#### 第四编 建国后杂文的挣扎和沉寂

(1949~1976)

|       |                             |       |
|-------|-----------------------------|-------|
| 第二十七章 | 思想的解放和禁锢与杂文的消长和兴衰 .....     | (383) |
| 第一节   | 建国初期的杂文论争 .....             | (383) |
| 第二节   | 移植的变异——“苏式小品文” .....        | (389) |
| 第三节   | 《人民日报》改版和“小品文的新危机”的讨论 ..... | (392) |
| 第四节   | 60 年代初的短暂繁荣和对“三家村”的批判 ..... | (400) |
| 第二十八章 | 建国初期的杂文 .....               | (405) |
| 第一节   | 夏衍的“灯下闲话” .....             | (405) |
| 第二节   | 马铁丁的“思想杂谈” .....            | (408) |



|       |                       |       |
|-------|-----------------------|-------|
| 第三节   | 周作人的“亦报随笔” .....      | (411) |
| 第四节   | “苏式小品文” .....         | (415) |
| 第二十九章 | 50年代中期的杂文 .....       | (420) |
| 第一节   | 《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杂文 .....   | (420) |
| 第二节   | 徐懋庸的杂文 .....          | (425) |
| 第三节   | 王任叔(巴人)的杂文 .....      | (429) |
| 第四节   | 严秀、黄秋耘等的杂文 .....      | (432) |
| 第三十章  | 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杂文 .....      | (438) |
| 第一节   | “龚同文”的杂文 .....        | (438) |
| 第二节   | 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杂文 .....      | (441) |
| 第三节   | 谢觉哉、陶铸、李欣、秦牧的杂文 ..... | (444) |
| 第四节   | “长短录”及其他杂文专栏 .....    | (449) |
| 第三十一章 | “三家村”杂文 .....         | (455) |
| 第一节   | 毛锥三管意纵横 .....         | (455) |
| 第二节   | “三家村”杂文的哲理品格 .....    | (458) |
| 第三节   | “三家村”杂文的文化意识 .....    | (461) |
| 第四节   | “三家村”杂文的审美特性 .....    | (465) |





## 第十六章 杂文大家周作人

周作人在 20 世纪中国杂文史上，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鲁迅。尽管他曾有过一段汉奸文人的可耻记录，但在他彻底堕落以前，他对中国新文学的创建和发展的多方面贡献，是属于历史的，不能抹煞的，特别是他对中国现代散文和杂文的贡献尤为突出。周作人同鲁迅一样，都是世界级的散文家和杂文家，而且他也像鲁迅一样，在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他不是孤立的存在，他是一种有影响的倾向和流派的代表。

周作人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存在，周作人的研究，始终是有争议的，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很正常的。不过其中似乎有一个问题为人们所忽视，或者说是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这就是周作人主要是一位小品散文大师，还是主要是一位杂文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说周作人是一位抒情记叙的小品散文大师，并没有错，他确曾写下一批名噪一时，甚而是可以传之不朽的经典式的小品散文，如果此时有人编选抒情记叙的小品散文的《今文观止》的话，周作人创作的那些小品散文名篇，绝对可以入选。这里的问题只在于，周作人的这些小品散文名篇，在他数量庞大的散文创作总量中究竟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周作人那些脍炙人口的小品散文名篇，其实只占其散文总量的 5% 左右。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只认为周作人只是小品散文大师，而看不到周作人主要是一位杂文大家，那就意味着，我们只是抓住作家创作本体总量的 5%，而忽视了其中的 95%，这不能不说是种不应有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疏忽吧。因此，这里问题的关键，还是回到作家的创作本体上来，对之作量和质的分析。具体说，我们在研究散文家和杂文家的周作人时，要一只眼睛盯住他的小品散文，还要一只眼睛盯住他的数量庞大的影响深远的杂文。就广泛多样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而论，周作人在其思想较积极时写过不少锋芒锐利的有关“社会”和“人事”的评论，应予肯定性评价，到了他思想消极蜕变甚而沦为汉奸文人时，他仍写过众多的介绍“神话学”、“童话学”、“民俗学”、“性心理”和“性道德”，以及评论中外古典文学和文化的读书随笔、笔记等等，涉及相当广泛的文化领域、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的杂文，对新文化的建设，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宣传，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这些方面，周作人的作用，是很少人能够企及的。我们认为，只有从周作人的本体的总体出发，既看到他是小品散文大师，更主要的是杂文大家，我们才能认识他的“全人”，这既是定量分析，也是定性分析。



## 第一节 周作人主要是个杂文家

在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时期，人们把散文称之为小品文，或小品散文，其中包括议论性杂文和记叙抒情性散文。周作人是一个负有盛名、具有影响的小品文作家。

周作人（1885～1967），是鲁迅的二弟，青少年时与鲁迅有着类似的经历：时代的变动，家庭的变故，求学的过程，从事文艺的兴趣等，几乎是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走着近似的路。他在日本留学时，致力于中西文学的研究，喜爱希腊文学，1911年立教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浙江省视学、中学教员，1917年起在北京大学工作，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讲授《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把他推入文学革命的浪潮。这时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论文、翻译作品、随感录和杂文，也发表了一些记叙抒情性的小品散文，是名重一时的理论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影响不在鲁迅之下。

“六三”运动是“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北洋军阀派军警镇压学生，周作人作《前门遇马队记》，愤怒地记录事实经过，这是他偏重记事的早期作品。他在北大工作期间，热心提倡儿童文学和歌谣征集，参加组建文学研究会，1920年在西山养病，发表《山中杂信》，记述山上的清静生活和游客、和尚们的杂事。此外，有《碰伤》一文，记述北大教职员向政府索欠薪被军警殴打的事。这些记事文章，他往往以揶揄的调侃的口气，时用反语，在描述不愉快的事情中做愉快的文章，作者说他喜欢这样别扭的笔法。他早期的记叙性文字，具有现实意义，以客观叙述，趣味笔调，“隔衣觉着针刺”的方法来显示它的特征。他偏重抒情的早期作品如《怀爱罗先珂君》三篇（1922、1923），抒发他对友人的怀念，写出爱罗先珂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对人类爱的理想，而这样一个善良的人竟为许多国家统治者所不容，他感到可笑。周作人以委婉的笔调述说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感，亲切隽永，读来像听一位长者慢声细语，以理节情，文字朴实自然而优美。

1924年，周作人写了较多的记叙抒情性的小品散文，且多名篇，如《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苦雨》、《苍蝇》、《吃茶》等。1925年的《乌声》，1926年的《谈酒》、《乌蓬船》等，这些都是周作人的得意之作，在自编的《泽泻集》、《知堂文集》中一再入选，可以说这些作品最足以代表他那些“化俗为雅”，平淡悠远的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的特色和水平，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京的茶食》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这几篇散文抒写生活中的趣味，显示着他对“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这是他在战斗之余用以解脱现世忧患的办法。

这一类散文展现了他故乡的风情，与鲁迅的着眼点不同，聚焦于生活情趣。他的故乡并不执着于原籍，住过的地方就是故乡，浙东、日本、北京都是。于是浙东的野菜，日本的草饼，东京的点心，北京的茶食，绍兴和南京的茶干；饮酒的趣味，乌篷船中听雨的诗境，对鸟声的渴望等等，都被写得兴味盎然。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对乡土的眷念，在文中所努力酿造的是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梦似的诗境，求得精神上慰安。由于这一目的，他在文章中援引古今中外诗文和名言逸事，用亲切的絮语，巧妙地解说，冲淡和平的文字，造成一种质朴清新，平淡悠远的审美境界，为许多读者所激赏，被公认为“小品文圣手”。

周作人在《泽泻集·序》里说：“戈尔德堡批评蔼理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泽泻集》中选有部分议论性杂文，其中自有叛徒在，另一部分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则更多存在着隐士，在他的趣味之文中也有某些揶揄之笔，如《谈酒》一文，在饮酒时脸变成关夫子等语之后有一括号，中云：（以前大家笑谈称作“赤化”，此刻自然应当谨慎，虽然是说笑话。）这样捎带来一点幽默，也不过是隐士的幽默。周作人在大革命之前确实写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但他这时的小品名篇多属忧患中寻找解脱的作品。

大革命失败后，他以为“现在中国情况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sup>①</sup>，于是他的杂文也逐渐收敛先前的锋芒，发展隐士的一面，他选定草木虫鱼，引文充斥，他的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名篇也颇少，心情更为淡泊而平定，失去先前的情趣。

阿英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流派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sup>②</sup>这是很有见地的。周作人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最有文学意味，“诚多有隐遁色彩，但根本上却是反抗的”<sup>③</sup>。周作人也喜欢废名的作品，因为作风平淡朴讷，有点“隐逸的”，也比较温和<sup>④</sup>。他们中间思想的共同倾向就是隐遁，或者说隐逸。如果从表现的手法来看，同一流派则有不少的差别。

对于自己的文章，周作人在《瓜豆集》中有一段话：“总之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

① 周作人：《燕知草·跋》。

② 阿英：《俞平伯小品序》。

③ 周作人：《燕知草·跋》。

④ 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



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只是我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之事也。”他感叹自己的文章还不够闲适，因为他前期的杂文确实有焦躁之气，前期的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也确已开了闲适的文风，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消极的一面。

周作人这些小品名篇，其艺术特点是以洒脱的名士风度，平和的感情，清谈的方式，天南地北的征引，多头绪的思路，来咀嚼欣赏生活的趣味，并出之以冲淡自然的文字。这类作品造成一种空灵之境，使读者心境宁静，获得隽永的韵味和兴会。周作人的小品的这些特色，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获得许多读者的欣赏是有原因的。许多知识分子深知世路多艰，乏力回天，写作这类小品散文作为消遣，排遣纷扰的世事，阅读者基于同样的目的欣赏这类散文，这是很自然的。更何况生活的趣味其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表现这种生活情趣的散文在文苑中自然应有它的一席之地。问题是时代越来越严峻，周作人再也写不出这类美文来了。30年代后，他逐渐刀枪入库，完全失去叛徒的精神，成为十足的隐士了，北平陷落后竟至失足“落水”厚颜事敌，只能以文抄公的笔调来写闲适小文，如《卖糖》、《炒栗子》、《蚊虫药》、《石板桥》等，多为空泛的说理，难免枯燥无味<sup>①</sup>，比起早期的小品就大为逊色了。

周作人的散文中所占分量最大的，并不是上述人们耳熟能详、交口称道的小品散文名篇，而是他进行“社会”、“人事”和“文艺”评论以及展示他的“杂学”的杂文。这有他的自述为证。

周作人在《〈苦竹杂记〉后记》里引他于1935年11月6日《答上海有君书》中说：“来书征文，无以应命。足下需要创作，而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在《〈立春以前〉后记》里说：“我写文章也已不少，内容杂得可以，所以只得自居杂文”，他这里说的“杂文”是涵盖所有杂体文章的，是广义的杂文。在《两个鬼的文章》里，他对自己所作散文作了区分，一类是表现闲适情趣的闲适小品，一类是“爱讲顾亭林所谓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正经文章”，实即杂文。周作人说他的读者里有两派，甲派只看到他的闲适小品，乙派既看到他的闲适小品，也看到他的“正经文章”，但他们要周作人多写或只写闲适小品。周作人则与这些读者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喝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他更看的是自己的“正经文章”即杂文。他更进一步说：

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来仰慕的。至今爱读，也是极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实力不够，一直未能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来，以此与正经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样写不好，但是原来不以文章为重，多少总已说得出的思

① 参看《知堂回想录》。



想来了，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满足的了。乙派以为闲适的文章更好，希望我多作，未免错认门面，有如云南火腿店带卖普洱茶，他便要求他专开茶栈，虽然原出好意，无奈栈房里没有这许多货色，摆设不起来，此种实情与苦衷望友人予以谅解者也。以店而论，我这个店是两个鬼合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只居其小部分，所以结果如此，亦正是为事实所限，无可如何也。

在这里，他把问题说得异常清楚了。他比闲适小品为“茶”、“酒”，比他称为“正经文章”的杂文为“馒头或大米饭”，他自己开的店铺是“云南火腿店带卖普洱茶”，都意在说明，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上，杂文都是主要的，如果只认他是闲适小品家，那就是“认错门面”了。

关于杂文，周作人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精辟见解，主要见于他的众多序跋。他的《美文》，是新文学中最早的散文理论建设篇章。他译西方的 Essay 为“论文”，又称之为“美文”，他所谓的“美文”，是包括批评议论的、记叙的和抒情的三大类。可见，他是把批评议论的杂文，也视为“美文”，划入美文学范畴的。这似乎是周作人的一贯的观点。在《文艺批评杂话》里，周作人阐述了他对文艺批评的看法。在文艺批评上，周作人倾向于法国法朗士的关于文艺批评是批评家的主观的印象的批评的观点。周作人指出：

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

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别的创作也如此，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

在这里，周作人把写得好的文艺批评，视为“美文”，“创作之一种”，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周作人把文艺批评和一切批评称为“抒情的论文”，意思也差不多。在 20 年代，周作人的杂文，主要是社会“人事的评论”和文艺批评这两方面，前者主要收在《谈虎集》，后者主要收在《谈龙集》里。周作人关于好的评论和批评是“美文”，是“创作之一种”的观点，在 20 年代初期，当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正在蓬勃兴起时，对于提醒人们重视和追求杂文的审美特性是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的。

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和一些杂文序跋里，谈到明末以来浙东文艺的两种流向和风格，谈到了他的“浙东人的脾气”，以及他的杂文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在《地方与文艺》里，他这样评述明末以来“浙东”的文化：



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序》说他的杂文，“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是“平庸的人的真表现”，“我的无聊赖的闲谈”。但在《〈雨天的书〉自序二》里，他则说：“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身上有着“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通称的‘师爷气’”。是同他在《地方与文艺》里论明末以来浙江文艺的两种潮流，即两种思想倾向和两种艺术风格相呼应的。在《地方与文艺》里，周作人曾提出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国民性、地方性、个性”的融合，那文艺便是“有生命”的。在这里，周作人主张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

周作人一贯鼓吹“个性的文学”（《个性的文学》），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是作家的自我表现。他在《〈近代散文抄〉序》里认为包括杂文在内的小品文，“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在《〈杂拌儿之二〉序》里，周作人借对俞平伯的杂文的评论，对杂文创作发表了极其重要的精辟见解：

平伯那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大旨仍旧是“杂”的，有些是考据的，其文词气味的雅致与前编无异，有些是抒情说理的，如《中年》等，这里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此外有几篇讲两性或亲子问题的文章，这个倾向尤为显著。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

严格说，这段话是周作人的“夫子自道”。在周作人看来优秀的杂文，应该是“文词气味的雅致”之外，兼有“思想之美”。那么，什么是“文词气味的雅致”？在《〈燕知草〉跋》里，周作人论及包括杂文在内的散文的“新文体”时说：

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

这是说“文词”的“雅致”，至于“气味”，则是他在《〈杂拌儿之二〉序》里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独有的东西，即独特个性和独特风格。而所谓“思想之美”，则



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周作人要求杂文在“文词气味的雅致”之外，“兼有思想之美”，是对杂文提出的极高的要求，甚而是“理想化”的要求。

总之，周作人强调杂文的审美特性，杂文要“浸在自己的性情里”，鲜明表现自我的个性，杂文在“文词气味的雅致”之外，还应“兼有思想之美”，他的这一系列杂文理论主张，是从他丰富的杂文创作实践，是从中外优秀的杂文传统中提炼出来的，触及了杂文的某些艺术规律，对理解周作人的杂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应予重视。

## 第二节 周作人杂文的演变

周作人的杂文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17年至1928年为第一期，就是上升发展期；1929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为第二期，这是日渐消沉没落期；八年抗战是第三期，这是全面堕落期。周作人杂文的演变，深刻反映了急速动荡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浮沉的历史悲剧。

在1917年至1928年间，周作人和鲁迅是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杂文作家。当时“周氏兄弟”并称，名重一时，被誉为“文坛上的双星”<sup>①</sup>，“两大权威者”<sup>②</sup>，他们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创造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在这期间，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园地》（1923）、《雨天的书》（1925）、《泽泻集》（1927）、《谈虎集》（1927）等以杂文为主的散文集，写于这期间的论文和杂文，还有以后出版的《艺术与生活》（1932），以及未收入集子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二百多篇。新文学运动兴起后，以议论为主的白话杂文，是先于记叙、抒情散文出现的，当时写作杂文的名家甚多，而能使杂文的写作成为带有文学创作性质的“美文”的并不多见。无论从数量、质量和影响看，“周氏兄弟”无疑是最突出的杂文家。周作人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上虽然和鲁迅不能相提并论，但他的杂文创作的广泛而凌厉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所表现的独创和深刻的思想、蕴涵的广博知识，娓娓絮语，诚挚亲切，质朴晓畅，幽默隽永的独特艺术风格，为开创和建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杂文，作出特有的贡献。

这时周作人杂文的思想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他自己的个性特色。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是当时新文学运动战士共同的战斗任务。在文学的“破旧立新”上，周作人和鲁迅也主张以新鲜活泼的白话文取代僵死老化的文言文，但他们更突出强调“思想革命”，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学主张高出许多只鼓吹文学形式

① 李素伯：《周作人的小品文》。

② 陶明志：《周作人论·序》。



“革命”的胡适等辈，而接近于陈独秀和李大钊。他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指出：“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变，徒有文字，也有有什么用呢？”“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不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明确主张：在“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个性的文学》和《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等，就是他在文学上实行“思想革命”的具体主张。

周作人对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是深恶痛绝的，批判是凌厉的。《祖先崇拜》痛快淋漓地批判中国的“祖先崇拜”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支配下的反常人伦关系，认为不应该进行“祖先崇拜”，而应是“子孙崇拜”。《祖先崇拜》和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鲁迅的《与幼者》和《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在批判“祖先崇拜”的同时，周作人突出鼓吹“儿童本位”的思想。性的道德和性的教育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也是周作人杂文创作中的经常话题，在这方面他常能谈出一些新颖而深刻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

周作人对妇女解放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在《新青年》上登载的《随感录·三十四》中，他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凯本德关于妇女解放须同“社会上的大改革”一起完成，“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的新颖见解，他不赞成女子参政运动，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这只不过是培养出一批女政客女猪仔罢了，他认为：“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个性的解放。”（《北沟沿通信》）这与以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么办》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1925年后，中国革命日趋高涨，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斗争中，周作人写了大量“评论人事”的杂文，他的思想虽然同鲁迅并不相同，但在政治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他在这些杂文中，揭露新旧军阀的反动残暴统治、反动文人的无耻嘴脸，态度鲜明地赞颂民主战士和共产党人，显示了他这些“人事评论”的杂文的战斗风格。

1925年的“五·卅”惨案后，周作人发表了《对于上海事件的感言》、《代快邮》、《吃烈士》等杂文。《对于上海事件的感言》主要是揭露英帝国主义的，《吃烈士》则指出社会上某些人以诬蔑惨案中牺牲的烈士来渔利是一种“吃烈士”的卑劣行径。在1926年的“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在和“现代评论”派与“甲寅”派的斗争中，周作人在他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共发表了250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仅他自己写的就有50篇之多，造成很大的战斗声势。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斥责章士钊等的“整顿学风”是“假道学”，是“巫医的野蛮思想”（《我最》），痛斥“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的行为是“说谎、反复、卑劣……尤其是没有人气。”“三·一八”惨案后，他对死难者深致哀悼，称赞刘和珍等烈士是“新中国的女子”，认为“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新中国的女子》）。



1927年4月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屠杀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蒋介石在南方以“清党”为名凶残屠杀共产党人，新旧军阀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把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浸在血泊之中。在血雨腥风之中，周作人揭露新旧军阀凶残暴虐的罪恶，嘲弄和怒斥助纣为虐的胡适和吴稚晖。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的情势下，周作人能冒险陈辞，为死难烈士伸张正义确是难能可贵的。在大革命失败后，这类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是日渐减少了，但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是深怀不满的，至1928年他写的《国庆日颂》就曲折表露了他的愤懑。

还能显示周作人杂文特色的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揭露和谴责的杂文。从1920年至1927年之间，他写了二三十篇十多万字这样的杂文，特别是在“五卅”运动前后，仅针对日本在华的汉文日报《顺天时报》而发的就有14篇之多，这些都收在《谈虎集》（下卷）。周作人的这些杂文，有较强的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十分敏锐，说理透彻，笔锋犀利，在当时的杂文创作中是较突出的。

以上几点显示了作为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周作人，他的杂文创作处于上升和发展时期的积极面。周作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非常复杂。这时的周作人比较真诚，他常常诉说他自己的思想的复杂性。他有时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个“杂货铺”（《西山杂信》），有时说他的文章中有着“叛徒”和“隐士”（《〈泽泻集〉序》），有时又说自己思想中有“流氓鬼”和“绅士鬼”（《两个鬼》），他思想中互相矛盾的双方，在斗争，在消长——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思想根本是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他鼓吹“新村主义”和人道主义，带有调和阶级矛盾、社会改良、博爱主义的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一面，他企图以“平和”的手段“造成新秩序”“以免将来的革命”（《新村的理论与实际》）。（二）他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他不能正确认识人民，正确对待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批判包括人民在内的“国民”的劣根性，但与此同时，他却得出：“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诅咒》）把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看为不可救药的民族和人民，因此他也像历来的“绅士”那样，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怀着一种“古老的忧惧”（《知堂回想录》）。（三）反封建的不彻底，早在1924年，他就自称为孔孟之徒的“中庸主义者”，在《生活之艺术》中，他竟说要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中国的“得救之道”，是“复兴”那作为孔孟之道经纬的“礼”。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周作人是不可能同封建思想决裂，也不可能彻底去反封建的。（四）周作人把新文学看作是“个性的文学”，是作家“自己的表现”。这种主张在“五四”初期有着反对“为圣人立言”，“载”儒家之“道”的传统文学主张，表现了文学的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李大钊和鲁迅提出把个性解放和人民大众的解放结合起来，周作人的这种文学主张就显得陈旧了。当时的周作人还和现实斗争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还能写出一批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战斗性杂文，以后随着他鼓吹“闭户读



书”，不谈“时事”，只写“草木虫鱼”，他同现实斗争隔绝了，他的“个性”日渐贫乏，这时他所写的“表现自己”的杂文也就日渐没落了。（五）他的个人主义的“现世思想”，使他只能像文艺复兴时代法国的拉伯雷那样，“不是狂信的殉道者”，“笑着，闹着”，但以不被“拿火来烤”（《净观》）为极限。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周作人就抱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第一要紧的人生哲学，消极避世了。

从1929年至1937年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周作人杂文创作的颓唐沉落期，这期间他出版的杂文集有《谈龙集》（1929）、《看云集》（1931）、《书房一角》（1933）、《夜读抄》（1934）、《苦茶随笔》（1935）、《苦竹杂记》（1936）、《风雨谈》（1936）、《瓜豆集》（1937）等，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写作“闲适小品”的杂文流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周作人于1928年底发表的《闭户读书论》，1929年底发表《三礼赞》和《伟大的捕风》等，都是他转向消极避世的联袂。

《闭户读书论》反映了周作人对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不满和深刻“烦闷”，但他也不敢也无力与之抗争，只能说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而为了排遣这种“忧郁病”，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闭户读书’”。《伟大的捕风》则更深刻表现了周作人严重的精神危机。“伟大的捕风”是由《旧约·传道书》里号称为“智慧之王”的所罗门的原话改造而来的。在《旧约·箴言》里，所罗门宣扬的是智慧之宝贵，占有智慧就拥有一切，但在《旧约·传道书》里，所罗门则反其道而行之，他鼓吹的是智慧愈多反而愈增加愁烦忧伤，他如是说：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里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

所罗门鼓吹的是历史的虚无论、循环论和宿命论。周作人在《伟大的捕风》里，几乎复述了所罗门的原话，并在“捕风”之前加上了“伟大”的定语，反映了他陷入怎样的精神危机。既然“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周作人就完全有理由把自我封闭起来，拒绝接受任何新事物新思想；既然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就什么是非，什么荣辱，都无所谓了。《伟大的捕风》是理解周作人此后的消极颓唐沉落的一个重要关节。

1930年初，周作人和俞平伯、废名、徐祖正等创办《骆驼草》周刊，宣称“不谈国事”、“立志做秀才”；要利用“有闲之暇”，“讲闲话，玩骨董”，写“草木虫鱼”



(《〈草木虫鱼〉小引》),开始明显转向消极。1934年,他发表了有名的《知堂五十自寿诗》后,就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左翼文艺运动。在这些年中,周作人的杂文创作总的倾向是消极的,但他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同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还是有矛盾,他的杂文消极中还包含一些积极的因素,他这时写的不少貌似出世的杂文中暗寓讽世之意。其中如《书法精言》、《赋得猫》、《文字狱》等文,隐晦曲折反对国民党大兴文字狱;如《关于征兵》、《关于英雄崇拜》等文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如《关于林琴南》、《〈现代散文选〉序》等批判思想文化上的倒退复辟;如《水浒里的杀人》、《鬼怒川事件》等为妇女儿童的人权呼吁……但这类文章和他的《五十自寿诗》一样奥涩,虽有“讽世”、“微辞”,却为“青年所不谅”<sup>①</sup>。他这时写的大量有关生物学、民俗学、神话学、性道德的小品文,以质洁苍老婉转自如的文字,熔博识与趣味于一炉,包涵着反对封建愚昧和封建专制的思想,也不能一概抹煞。

这时周作人的杂文讳言“时事”,所谈的是他自认为“横通”的“杂学”,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生物遗传学、性道德、性心理和儿童心理学,以及明清以来笔记小品中他认为有趣的东西。这类文章失去前期那种敏锐的现实感和“浮躁凌厉”的批判锋芒,文字是愈来愈古雅了,趣味是愈来愈琐屑了,常见他在一篇文章之中,大段大段地抄引古书和洋书,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文抄公”,这时的周作人在思想、情趣、生活方式和文学主张上都封建士大夫化了,也就是说他已从前期“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sup>②</sup>的新文化运动战士,变为“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的封建主义“隐士”了。周作人向封建主义的大幅度倒退是惊人的,但又是轨迹可寻的,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时代悲剧。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幽灵有着特别顽强的渗透力和腐蚀力,在西方曾经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全胜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中国只能打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在中国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于是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封建主义复辟的悲剧、喜剧、闹剧和丑剧,而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一大批又一批曾经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周作人、林语堂等都先后走上复古倒退的路,这甚至在共产党内搞“家长制统治”的陈独秀、王明一类的共产党人身上也有所表现,这确是耐人寻味的历史教训。早在1924年,周作人就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现在则更系统地提出要恢复孔孟儒学的礼、中庸、仁恕,并在此基础上糅进道、法、释诸家,糅进西方的生物学、人类学、性心理等“杂学”。这时的周作人满足于这样的生活:“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纸,刻印章,说印泥,说梦,宴会,延僧颂经,搜集邮票,刻木版

① 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

② 钱玄同:《和知堂五十自寿诗》。